

“性别与叙事伦理”专题研究(笔谈 3 篇,主持人:林丹娅)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8.01.021

主持人语:随着 21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都市化的迅猛发展,城乡经济形态的骤变,中国传统联结人际关系的伦理形态,也随之骤变,且更具交杂性。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或多或少反映在作家书写中,一方面是作家或自觉或不自觉体现在文学叙事中。换言之,文学书写中所呈现的叙事伦理,既折射着社会现实之诉求又反射着作家理念之建构。因为说到底叙事伦理首先潜在着作家主体的叙事意旨、叙事策略、道德立场、价值判断、文化选择乃至美学追求等叙事质素。而从性别的维度来考察叙事伦理在文本中的建构,是近年来性别与文学研究关注的重要命题,为此我们特意组织了这三篇论文。王怀昭的《论贾平凹小说〈极花〉中的叙事伦理》从文本分析出发,对作家持有的叙事伦理态度进行深层剖析,提示无性之爱与无爱之性的固有伦理在叙事背景下得以合法化的叙事危机。其实,在层出不穷的城乡贫富男女关系故事中,作家困囿于貌似生活的原生逻辑,无法突破固有叙事伦理本身说明了什么,这也值得进一步探讨。须一瓜小说近些年来广受读者瞩目,多部作品被拍成影视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她擅长从浑沌生活的明涡暗涌中淘洗出人性各色,突破人知的边界,昭示伦常的悖谬,叙事角度独特,手法独特。周师师的论文对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的“人性”叙事进行探究,此论文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运用叙事视角作为理据,把作家的叙事伦理向度与叙事内在肌理的建构联系起来观照,构成了一种自洽性阐释,作者的思辨能力为解读作家叙事的独特性做出启迪性的有益尝试。郑斯扬的论文则从新世纪以来颇具代表性影响力女作家乡土写作中,分析并发掘女性乡土写作的伦理逻辑,归纳并揭示出其所具有的三大内涵之特质,并认为这是她们应对乡土背景下道德问题所做出的思考,并同时也指出这种写作的局限性。此论文无论是对这方面的创作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都是值得参考的。

(林丹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贾平凹小说《极花》中的叙事伦理 ——兼谈《哦,香雪》《妇女闲聊录》*

王怀昭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精神立场出发阐释贾平凹新作《极花》可见多维伦理关系叙事向度:无性之爱与无爱之性的情爱伦理,多元伦理价值下的妇女生存困境。同时,对《哦,香雪》《极花》《妇女闲聊录》这三个有关农村女性的小说文本互涉对照,或可思索在转型的大时代中,农村女性的真正出路。作家关注,提供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呈现与思考也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参照。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故事伦理;叙事伦理;妇女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8)01-0122-04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8.01.022

2016 年,贾平凹出版新作《极花》,作家直击拐卖妇女这一社会底层人生活的现实问题,用小说讲述云南农村女孩胡蝶在进入城市后,被拐卖到西北的一个荒凉农村,几经出逃而不得,最终被强暴、被箠训、被解救却又心甘情愿地回到被拐卖农村的故事。作家反思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农村存在的伦理失序、道德失范乱象,农村迅速凋敝以及农村男性越

趋艰难的婚姻问题,从而显示出多重伦理之思。由于“伦理本质上在于建立一种人心秩序,因而当叙事把无序的生活重建为有序的叙事时,叙事首先就在心理上契合了伦理的根本要求”^{[1]24}。那么,小说中的伦理与叙事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呢?换言之,文本的伦理之维如何通过叙事之维表现出来,叙事之维如何织就伦理之维,从而达到作家和小说

* 收稿日期:2017-07-30

作者简介:王怀昭(1989—),女,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研究”(项目编号:17CZW050)相关成果。

文本本身对多维伦理关系叙事向度的体现。

对小说而言,叙事伦理聚焦于伦理之维与叙事之维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引入叙事伦理这一理论概念。叙事伦理蕴含两个面向,即小说故事伦理和小说叙述伦理。“故事伦理一方面是对理性伦理内容,比如时代的重大伦理主题的叙事呈现,另一方面作为虚构和想象的世界,小说叙事也同样在探究某种伦理的可能性,”即伦理乌托邦建构。“而叙述伦理则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小说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小说中的互动关系。”^[14]简言之,叙事伦理体现着作家主体性的叙事目的、叙事策略、道德哲学、文化选择以及文化立场等。

一、情爱伦理:无性之爱与无爱之性

“爱情是人伦关系中富有情感张力和言说价值的伦理关系。”^{[2]59}因此,“爱情伦理叙事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在不同的爱情叙事模式中蕴含着作家的叙事目的、叙事意旨、道德价值判断趋向、文化立场选择和美学风格诉求等叙事伦理质素。”可以看到,小说《极花》中的情爱伦理包含两个面向:作为心灵抚慰剂来叙写的爱情体验和作为生命本能来呈现的无爱之性。

当胡蝶被拐卖到西北偏远山区的一个名为圪梁村的小村落,她被监禁在窑洞中,行动不得自由。她逃跑,却被村里人抓回来殴打、遭受言语的羞辱和非人的虐待。她的身体屡次遭到黑亮的觊觎,而胡蝶能做的只是摔打东西、咆哮、肆意破坏,或者撕破床单把自己从腰到脚绑了无数道,打上死结,以免被侵犯。她度日如年,在白天里等着天黑,天黑了又不敢睡,看着夜里的星。于是,当她回忆起房东老伯的小儿子青文,心中便满是柔情。这是她的生命中体验过的短暂而又朦胧的爱之喜悦。回忆使胡蝶因被拐卖、被虐待所受到的身体伤害和心灵伤痛暂时被抚慰了,过去时间的流淌把现在时间的残酷以及对未来时间的无望与恐惧浸染为温馨美好的爱情伦理港湾,让她能暂时从现实的残酷中抽离出来,脆弱不安的生命凭此得到小小的喘息。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青文的模样留在了胡蝶的心里,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搜寻他的身影,“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在大院里看有没有青文的身影,常常是没有见到,这个下午直到第二天我都慌慌的”,“而一旦看到青文了,我的情绪非常好,我会穿上那件小西服,剪了头发,一会儿去水龙头那儿洗菜,一会儿去院子墙角处倒垃圾。”^{[3]57}小说文本中的爱情伦理叙事并没有把爱情叙写成唯美崇高的抽象存在,或者是政治性的价值存在,也并不涉及肉欲,而只是女性生命中极为私人化和人伦化的性别体验。然而这一场暗恋注定无疾而终,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是巨大的阶级差异和教育背景差别,与其说胡蝶喜欢上的帅气的、上大学的青文,不如说她骨子里作为收破烂租户的女儿的自卑让她拼命想要获得城里同龄人的认同,于是她试图用自己的美貌来吸引青文,而穿上高跟鞋以减少心理落

差、增加自信心即是明证。

昆德拉说“在我的作品中,一切都以巨大的情欲场景告终。我有这样的感觉,一个肉体之爱的场景会产生一道强光,它突然揭示了人物的本质并概括了他们的生活境况……情欲场景是一个焦点,其中凝聚着故事所有的主题,置下它最深奥的秘密。”^{[4]145}这句话可以印证小说《极花》中的性爱伦理叙事。贾平凹擅长写性,在叙事文本中,性爱作为重要的叙事符号被反复铺排展现两次。当黑亮吃了血葱,他被压抑已久的欲望本能就全部爆发出来,强烈的性欲驱策着他,他变得蛮力十足,脸部变形通红,狼一样强暴着手脚被村里男人捆绑在条凳上动弹不得的胡蝶。这是一场无爱之性。在充满血腥暴力的性欲场面中,作为农村男人的黑亮,他的性欲得到满足既标志着农村原本蕴藏的生之生命力的喷薄,也暗示着从农村到城市,又被拐卖到农村的可怜的女性胡蝶最终逃脱不了以失去贞操为代价而被迫留在圪梁村的悲惨命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势单力孤的女性在强大、野蛮的农村男性霸权下不得不沦为男性泄欲的物质工具而无力反抗的悲哀生存境况。

贾平凹深深地同情被强暴的女性,他并不否定被拐卖女性的身心所遭受的伤痛之巨大,但他也对在转型时代中偏远农村里的男性的性苦闷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感叹“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3]207}。作家对乡村男性无法结婚的同情态度使得他在描摹这一血腥的性欲场面时,并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道德评判,他强化了性爱场面的分析性,而让议论性的叙事话语趋于消弭。此外,可以看到在小说文本中,作家游移了原本的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以胡蝶灵魂出窍后的眼光来观看这一性爱场面,同时观看那些村中的男人如何挤在窗外偷窥黑亮强暴胡蝶。这固然是由于作家的男性身份使他无法真正描摹出女性身体在遭受到强暴时的真实疼痛生命体验而采取的叙事策略,但从另一方面说,性爱叙事借助“偷窥”视角完成,这种双重的观看视角的运用无疑使得性爱场面的血腥和暴力的情感冲击力被削弱了。读者的惊悚体验被暂时压制,取而代之的是对胡蝶的深深怜悯。但作家本人并没有完全抑制对这一事件的惊悚感受,他的同情与愤怒呈现为叙述者话语的干预^①,散布在文本各处,通过感情色彩鲜明的词语表露出来。比如,黑亮在性爱中的蛮横表现使得胡蝶的灵魂认为“黑亮是疯了,他成了野兽,成了魔鬼”^{[3]69}。又如,黑亮的性爱状态“如同被火燃烧着的一根木棍”,而后身体又像“柴捆子一样”瘫在地上,这一比喻显然体现了叙述者对生理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的黑亮,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和理解。

小说中的第二次性描写是在胡蝶有了身孕之后。当她偶然在天空中看到了寻找已久的属于自己的星星时,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于是她回窑后主动要求土炕上不放木棍。作家极尽描摹之能事,以小说人物胡蝶的内聚焦视角来叙写这场鱼水之欢,着重强化胡蝶在性爱体验中的心理状态、行为动作。表面上,这场性爱体验是胡蝶和黑亮彼此主

^① 查特曼把叙述者干预分为对叙述(话语)的干预以及对故事的干预。前者被称为“隐含”评论,主要是对于形式,也就是叙述者自身的叙述干预。后者则是对叙事内容的干预,也就是公开的评论。见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动的两性结合,它是人类生命本能欲望的张扬。实际上,胡蝶的主动求欢反映出在经过长期的挣扎、反抗而不得,最终沦为男性的性欲工具之后,她终于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是圪梁村的人之可悲生存境况。女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及被逼压被箴训的骇人体验,都是导致她最终妥协的重要原因。而作家之所以把这场无爱之性叙写为鱼水之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作品中倾注了对现实生活中那个老乡的女儿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因而不愿意让胡蝶如此坎坷的人生遭际毫无生命的温暖与亮色;另一方面,贾平凹难脱男性的身份,他依然以男性的眼光来叙述小说事件,在叙述过程中,他的情感指向施害者而不是受害者方面靠拢,此外他对乡村男性长期受到性压抑而得不到满足的深深同情和理解也决定了他的价值倾向和伦理立场,于是这场无爱之性就被披上两性主动结合的外衣。

不管是胡蝶朦胧青涩的爱情体验,还是在身体被捆绑后的被强暴,抑或是她在有了身孕之后的主动求欢,从无性之爱到无爱之性,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叙事都根植于农村女性的情爱心理状态,力图呈现女性的生命存在体验。情爱成为小说叙事框架的肌理之一,爱情体验的呈现和性欲场景的铺排展现乃是小说情节发展、小说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与生存境况的变化的功能性元素。

二、多元伦理下的妇女生存困境

“作为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54]城市具有这样的特性:它“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这些地点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追求精神刺激……这同乡村那种较为固定的、内向的和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56]。与农村相比,城市变成欲望的集散地,这是一个人的主体欲望永远达不到满足的“经济世界”。在中国的大转型时期,城市不断兴起壮大,农村女性在城市中的命运无非几种:或是在工具的支配下一次又一次地获得酬劳,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或是因有几分姿色而被包养,沦为妓女,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或如胡蝶们,幻想着能轻易挣到钱,却因无知落入到人口贩子的手中,被他们拐卖,去到一个更为贫穷的农村。

城市的扩张导致中国农村的空前溃退。原本的传统道德伦理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村沃土而走向衰微,甚至一败涂地。圪梁村不过是中国众多空村中的一个。因为贫穷,村里的姑娘不肯内嫁,于是村中没有去城市打工的男人就变成了光棍。当“性”作为一种生命欲望的本能与人类传宗接代的“生殖伦理”紧密结合时,它就爆发出可怕的力量。何况,这还涉及村庄能否存活下去的实际问题。买媳妇成为唯一的也是必须的手段。胡蝶是买来的,三朵的媳妇是买来的,马角的媳妇是买来的,安吉的媳妇是买来的……为了防止媳妇逃跑,“马角把他媳妇一买回来时就打断了一条腿。”^{[3]162}三朵的媳妇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回来。更可怖的是,还会有更多的外来女性被买来,被拐来。訾米虽然好心地招呼从河南和甘肃来挖极花的王云、严萍们,可是她们的身体却难免遭到猴子、宽余、银来等人的觊觎。他们是狼,来訾米窝里吃肉来了。

畸形的婚姻关系必然无法培育出正常的夫妻关系。这

些长着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男人们强狠、冷酷、暴力,把自己的媳妇当作出气筒,随意殴打她们,夫妻之间应有的温情和伦理责任感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时两性之间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丢了母驴,三朵打了媳妇一顿。三朵媳妇哭得眼泪汪汪,却不敢还手不敢还口。半语子和麻子婶吵架吵不过了,手里拿什么就拿什么打她,把她打得鼻青脸肿。为了帮胡蝶打掉胎儿,麻子婶偷采苦楝子籽给她,事情败露后,半语子把麻子婶“那妖精打了一顿,骨头打断了,在炕上躺着”,^{[3]89}丝毫没有愧疚之意。而女性在面对村中如此强大的男性权威,却丝毫不敢反抗,三朵媳妇逆来顺受,麻子婶得过且过,訾米则自我放逐。对訾米来说,立春不过是她为妓多年、人老珠黄后的一个物质依靠,他们之间不存在爱情,只有以金钱为交易准则的肉体关系。

女性身体被物化,成为男性财产的一部分。立春和腊八分家时,訾米的归属感成为二人争夺的重点。“谁要柜子,箱子,方桌子和五个大瓮就不能要訾米。”^{[3]117}更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当胡蝶问訾米“你没意见?你是人还是财物?!訾米说:我只是个人样子!”^{[3]118}女性自己也主动认同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作为男性私有财产的畸形设定,直言自己不是拥有自我意志、自主决策权利的主体。而驼背了的菊香,则毫不羞耻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与村长交换戏台上的便宜木料。贾平凹揭露出女性在被阳刚菲勒斯文化拘囿、箴训、同化后所表现出来的奴性的一面,他笔下的女性既无温柔贤淑、无私伟大的“妻性”、“母性”的传统伦理美德,也无现代伦理赋予女性的独立自主的特质,而被原始化到“动物性”的层面,成为满足男性生理需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因此,在传统伦理道德濒临死亡的圪梁村,黑亮的娘注定只能存在于小说的叙事背景当中。黑亮的娘以她的死亡来终结原本的传统妇德的一切伦理意义。死亡,否定了她作为村中好女人的美好存在的伦理价值。她的温顺性情、干净面相以及贤惠品质,成为黑亮追忆的温馨的伦理港湾,其中浸染了黑亮对粗恶的现实处境的不满和无奈。

不管是訾米、菊香被物化的女性身体,麻子婶、三朵媳妇被毒打不能自主的“他者”身份,胡蝶被强暴继而主动寻求鱼水之欢的性别体验,还是黑亮的娘被塑造为温柔贤德的妇人的男性性别想象,小说中的农村女性们都无法逃脱出不能自拔、无法自主、卑下麻木的生存困境。同时,訾米、胡蝶们的被拐身份又加剧了这种为妻和为母的卑下难堪,使得她们的生命历程变得更为艰难。农村中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村中男人的群策群力的共同监视、家庭中以贤妻良母为准则的道德规约、男人的生命欲望本能的觊觎合力把女性的身体一重重围困、箴训、施压、威逼在密不透风的男权网罗里面,使她们如飞蛾落入蜘蛛网一般,无法逃脱、任人摆布。

贾平凹显然不愿意让女性在这种黑暗无望的生存困境中,看不到一丝的光明和盼望,他所描绘的圪梁村,依然有星星点点的传统伦理温情,他笔下的女性,在困顿的生命历程中,表现出了令人辛酸的挣扎和反抗。胡蝶在被拐卖后试图逃跑多次,多番抗争。麻子婶被碎石土块砸中昏死多天,又顽强地活了过来。訾米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作为伦理

主体的个人的存在,她自主把控着自己的身体,不让自己沦为生育的工具。当立春骂誉米是盐碱地,造不出孩子,她笑言,“别人是实用的,我是艺术的。”“我偏不给他怀,孩子是爱做的产物,我并不爱他,我是带有避孕环的。”^{[3]117}

三、多元伦理下妇女出路的可能:从《哦,香雪》到《极花》

以胡蝶的女性视角来鉴察中国农村伦理秩序的失范,思考城市的扩张给农村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并追溯妇女拐卖的复杂因由,这固然体现了贾平凹对妇女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的大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及时而又深刻的思考。但是作家在反思城乡纠结关系、表现乡村传统伦理与城市现代伦理之间的激烈碰撞与纠葛时,似乎忽视、或者说规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能否实现妇女的身体和心灵的真正解放?如果乡村伦理秩序中的传统社会角色设定依然使妇女成为物质化的附庸,陷入到无声的历史文化深处,城市文明又不能为妇女提供一种新生活的可能,那么,妇女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呢?

事实上,关于农村女性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城市代表现代文明,农村代表愚昧落后)中如何生存,有何出路的问题在女作家那里有着不同的表述。我们可以把《极花》与铁凝《哦,香雪》、林白《妇女闲聊录》做一个比较。发表于1982年的小说《哦,香雪》讲述的是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悄然开始的时候,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火车每天在偏僻的山村台儿沟停留一分钟,村中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们就像高兴得跟过节一样。她们利用这一分钟的时间以鸡蛋、大枣、核桃等农家特产与车上的旅客交换纱巾、发卡、尼龙袜等城市的物品。农村女性香雪仿佛是现代化前夜时期的胡蝶,她有着天真单纯的性格,是村中唯一一个考上公社中学的女孩。为了与女学生换取象征着知识的自动铅笔盒,她被火车带往离家三十里的西山口,再一个人沿着铁轨道走回村。但是在她心目中,这是值得的。对她来说,自动铅笔盒能带着她进入城市文明的新世界,它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他们每天吃几顿饭了”^{[6]13}。香雪朴素而热烈地追求、憧憬着明天的文明,完全不知晓市场经济的残酷性,她的思想里有着非常明朗积极的社会心态。同时,她期盼着以读书摆脱农村人的窘迫和卑微的困境。

《极花》中的胡蝶则是想读书而不得、在生计的逼迫下进入了城市的香雪。爹死后,她的读书生涯也随之结束,跟随娘到城市拾破烂。城市文明固然令人向往,却也容易让人滋生虚荣心。这是一个欲望的集散地,胡蝶以为进入城市就是城市人了,为了要有城市人的形象,她把娘辛辛苦苦捡来的两车废品卖掉买了高跟鞋。这与香雪因用四十个鸡蛋换取自动铅笔盒而感到内疚的心理全然不同。高跟鞋这个意象在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它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因此当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后,黑亮给她换上一双布鞋,她死活不穿,因为对她来说“失去了高跟鞋就失去了身份”^{[3]19}。它也象征着女性虚荣心的膨胀,例如胡蝶每日一有空就在穿衣镜前照高跟鞋;与其他被拐女孩一起在酒店时,她暗自嘲笑她们穿不了

她的高跟鞋,天生不是城里人的命。同时它又是女性自卑心理的补偿物:暗恋青文后,胡蝶就穿上高跟鞋寻找他的身影。横流的物欲已经悄然侵蚀人性中纯良的那部分,就算没有被拐卖,胡蝶至多如千万个在城市中辛苦打工的女孩们一样,成为残酷的市场经济巨轮中的牺牲品,一日一日麻木地在工具的支配下获得酬劳,被异化为城市的“他者”。

与贾平凹的《极花》一样,林白的《妇女闲聊录》(2005)以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以农村女性木珍的眼光来观察王榨村中的人事。作家着重选取女性身体疼痛、夫妻关系、性关系来凸显农村女性的际遇。村中的女孩子是另一个版本的胡蝶,她们不甘愿在城市辛苦打工,而以出卖自己的身体——当二奶来满足物质的欲望:香苗初中念了半截,他爸爸得肺病死了,她就不念了。人家介绍她到武汉,开始的时候说是在看网吧,后来就去当了二奶,她的那个所谓的干爹比她妈还大两岁。还有一个女孩,也是在武汉当二奶,还把自己的妹妹给带去了。她把自己当二奶挣来的钱拿来给家里盖房子。上广州打工的女孩们随便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没嫁人就怀孕了。村中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混乱,男女之间对传统的夫妻伦理关系看得很淡薄:木珍到北京打工后,她的丈夫小王就与冬梅相好了。木珍知道了也不生气。双红年纪快四十岁了,“谁给她钱她就跟谁睡,她丈夫很老实,不管她。”^{[7]102}林白以“妇女闲聊”的叙事策略全面呈现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王榨村中男性与女性们(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境况。如果说胡蝶鉴照的是偏远农村区域里濒临死亡的传统道德伦理,那么中年妇女木珍诉说的则是在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中,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如何被残酷的市场经济挤压、规训、异化,而逐渐丧失了人与人之间传统伦理的温情和伦理责任感。

概言之,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都不约而同的以农村女性的遭际为切入点,并涉及农村女性的生存境况、生存出路问题。发表于新时期伊始的《哦,香雪》为农村女性描摹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明天,现代文明之光的照耀让大山沟里的人们看到了摆脱愚昧落后的生活困境的诸多可能性,而以读书为渠道获得知识权力、进而获得物质资本乃是作家为农村女性香雪所铺就的光明道路。显然,这条光明道路对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农村女性来说尤为艰难。当中国进入到消费时代,涌入城市的男女们在残酷市场经济下无所适从,人心欲望在商品诱惑下悄然膨胀,进而自我沉沦:当妓女、做二奶,或者在小工厂中日复一日地劳作,成为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而他们原本的家乡,就成为传统道德衰微、伦理失序的底层民间。在大转型的时代中,除了“打工村”、“空巢村”,还有偏远的贫穷农村区域。村中的女性被城市吸走,而没资金没技术的男人就留在农村,成了光棍。性欲的要求和传宗接代的传统伦理观念使他们变得强狠、暴力,靠买妇女来维持村庄的生机。那么,胡蝶、誉米、麻子婶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是老死在圪梁村,还是当有一天城市文明的齿轮碾压得圪梁村的人无法生存,她们又如木珍一般,到城市打工?

四、结语

贾平凹的《极花》讲述的是农村女性胡蝶到城市谋生又被拐卖到偏远农村的悲惨遭遇,小说以胡蝶的眼光来观照农

村中的传统道德衰微、伦理失序的乱象。《极花》以情爱伦理叙事呈现胡蝶的生命存在体验,不管是她对房东老伯儿子青文的青涩爱情,还是被拐卖后遭受的蹂躏,抑或是在被箴训后的妥协和主动求欢,情爱体验成为呈现胡蝶的心理状态和生存境况的“温度计”。在农村传统伦理和城市现代伦理之间的激烈碰撞和纠葛中,农村女性面临着多重生存困境。胡蝶从被强暴到主动求欢的性爱叙事伦理不过是圪梁村中买来的媳妇们的从挣扎、反抗到妥协、寻求和解的悲凉遭遇的映照。女性身体被包裹在以宗法制度、道德规约、男性欲望为脉络的密不透风的男权社会网罗中,无法自拔,泣血挣扎。

在城市不断扩张、农村面临溃退继而逐渐死亡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的乡土伦理秩序的重建已然不可能,即使可能,也无法实现农村女性身心的真正解放。那么,农村女性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呢?新时期伊始的《哦,香雪》固然为农村女性描摹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明天,指出了以读书为渠道获取知识权力和物质资本的道路,但是,这种现代化前夜的光明积极心态必然要被商品经济的残酷所击碎。在现代化进程发展过程中,涌入到城市中

的农村女性们,或如胡蝶们滋生虚荣心,或如王榨村中的女孩子们经不住物质的诱惑而迷失自我,沉沦堕落。无路可走,这是大转型的时代中包括农村男性在内的农民们的深层悲剧。而中国的道德伦理秩序如何建构,中国的农村男女如何安居,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 [2] 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 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3] 贾平凹.极花[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4] 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 认识米兰·昆德拉[M].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 [5]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 宋俊岭, 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 [6] 铁凝.哦,香雪[M].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8.
- [7] 林白.妇女闲聊录[M].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Narrative Ethics in the Jia Pingwa's Fiction *Ji Hua*

WANG Huai-z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men University, Xi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piritual standpoint of feminist care ethics, the paper interprets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on of ethic relations, including love ethics of love without sex and sex without love and women's survival dilemm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ple ethical values.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fictions, *Xiang Xue*, *Ji Hua*, *Women's Chat*, the paper tries to think about rural women's future in the great age of transition.

Keywords: Jia Pingwa's fiction; story ethics; narrative ethics; survival and predicament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周师师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关键词: 须一瓜小说; 家庭伦理; 人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8)01-0126-05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8.01.023

* 收稿日期: 2017-07-30

作者简介: 周师师(1989—),女,河南焦作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性别文学及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福建重要女作家作品研究”(项目编号: 2014B063) 相关成果。